往事

我在东北当记者

“东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也是我学习锻炼成长的地方。四十年过去了，那段时光，那片土地，那些伙伴，依然铭记于心，历历在目

闵凡路

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从1978年8月到1980年1月，我从新华社总社下派到黑龙江分社和辽宁分社，当了两年记者，奔走于白山黑水间。这是我40多年新闻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从北京到哈尔滨、大庆

1978年8月10日下午，时任副社长穆青同我谈了一次话，说“社党组同意你到分社锻炼的请求，决定派你作为分社负责人，到黑龙江分社，协助分社社长孙铭惠搞好报道。希望你下去好好锻炼，做出成绩。”我那时43岁，已在总社工作了21个年头。

8月21日，我坐火车从北京到达哈尔滨。这里曾是我度过大学生活的熟悉的城市。

文革十年刚刚结束，这座美丽的城市明显带有那场风暴造成的创伤痕迹。入夜，街上的路灯发出昏暗的光，电力供应十分紧张。街头冷冷清清。

安顿下来之后，未上班之前，我先去拜访母校哈尔滨外语学院(现黑龙江大学)班主任李景琪教授。只见他从厨房拿来一个小包，在桌上一敲，当当响，说“你这个大记者猜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我一时茫然。他说：“这就是哈尔滨的蛋糕！”

上班当天，社长孙铭惠向我介绍了分社的情况，欢迎我来协助工作。老社长亲切而坦诚，让我感到温暖。我也与采编主任雷仲予、康伟中，办公室主任陈仲明见了面。我提出，过去多年从事国际报道，对国内报道不熟悉，希望大家多帮助。我愿意先到大庆油田住一段，体验一下。他们都表示支持。

8月下旬，我坐分社的吉普车前往大庆。黄昏时分，晚风凉爽，四野空旷无人，一片草原景象。汽车全速前进。

新华社大庆记者站在著名的大庆七号院。虽然是平房，可不是一般干打垒，里面条件很不错，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兼卧室。站长郭玉德多年在大庆采访，情况很熟，也很能干。由于大庆油田当年在国内的特殊地位，新闻报道量很大，记者力量配备较强。记者有王德华、陈坚发、周佩琪、徐英杰，后来又来了王长宽以及总社国内部工业组长张新民。分社康伟中、石堪砺、范惠琛也常来。记者站每天很热闹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大家聚在一起，聊天侃大山，议论纷纷，那正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，大家对国家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，对理论务虚会，对真理标准大讨论，对农村大包干，对柬埔寨战争，天南海北，国内国外，热烈地议论着，争论着。

白天，我与记者一起出去采访，听大庆人讲大庆的故事，看石油人在井台采油，也参加油田指挥部的电话会议，感受大庆人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。我陆续写出了《大庆向现代化大油田迈进》等报道，以及一些人物专访和通讯。那四个月，很愉快，很充实。

过了春节，我回到哈尔滨，在分社编辑签发稿件，也下去采访。那年春天，吃肉难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号称北大仓的黑龙江省。为此，我选定了一个调研采访题目《黑龙江吃肉难问题调查》。我采访了省经济和农牧业部门、商业部门负责人。被采访者当时对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信心。他们认为，黑龙江石油、森林、煤炭，以及动力、机械工业较为集中，靠自己力量解决吃肉问题是很难的。没有想到，三中全会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吃肉问题很快迎刃而解，出现了猪肉进关的新景象。

1979年春，中越边境战事吃紧，当时中苏对峙，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苏边界。由于担心苏联在北边进犯，地处前线的黑龙江省也在备战，以防万一。我们黑龙江分社也作了相应准备。后来事实证明，中苏边境并未发生军事冲突。

4月，在报道完松花江两岸春耕备耕之后，我回到总社，参加国内工作会议，社领导告知我调任辽宁分社副社长、党组副书记，从而结束了在黑龙江九个月的记者生活。

转战辽宁

在总社，穆青副社长再次与我谈话，肯定我在黑龙江的工作成绩，说“辽宁分社报道任务重，社党组决定改派你到辽宁任职”。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。

五一过后，我就来到沈阳。此时，东北已是春回大地的季节。一派生机盎然景象。

当时的辽宁分社，还在沈阳市中心，原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大楼。由于辽宁经济在全国的重要地位，报道任务重，辽宁分社也是大分社建制，记者力量配备强。这里有不少全国有名的老记者，如李沉、徐放、崔诚五、顾铁风、王殿学、高方、李彦、程尚荣、张向波、张振镛、邢犁夫、苗明等。李惠民在我调到辽宁的同时，从辽宁调到黑龙江分社任副社长。

分社社长孔庆举，副社长李沉、马桂才向我介绍了分社和辽宁省的情况，与分社的同志见了面。我与老社长李沉在一个办公室。他是新四军干部，老革命，一头白发，和蔼可亲。

沈阳的经济状况当时依然艰难，吃住条件都比较差，与黑龙江差不多。分社对我照顾得很周到。

在沈阳住了一段时间，初步熟悉情况后，我便到鞍山采访。我们在鞍山设有记者站，康文第为站长。他陪我跑鞍钢。鞍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，为共和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。我在鞍山住了半个多月，采访了炼钢厂、采矿厂、电厂，跑遍了整个钢城，使我对钢铁工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，写了一些新闻和通讯。

跑完了钢，我想跑电。当时的东北，百业待兴，工业和民用电力都十分紧张，拉闸限电是家常便饭，令人头疼。如何解决这个难题？东北电力状况究竟怎样？我同分社领导商量后，决定到东北电网调研。那是1979年10月，东北已是草木枯黄的秋天。我和年轻记者王启星开始在东北三省采访。我们把大连发电厂作为第一站，由南向北，辽宁清河发电厂、抚顺热电厂、吉林小丰满电厂、黑龙江镜泊湖电厂、齐齐哈尔新华电厂，最后在沈阳采访了东北电力管理局负责人。坐火车，转汽车，晓行夜宿，行程数千公里，走了半个多月，访问了近百人，包括电厂负责人、技术人员，用电大户，经济部门负责人，对东北电力吃紧及电网管理问题有了较深入的了解。

此次与我同行的工业记者王启星，年纪很轻，勤奋好学，肯动脑筋，文笔也不错。我们配合默契，合作得很好。他后来相继当了辽宁分社副社长、山西分社社长、半月谈杂志总编辑。

东北电网采访结束后，我和王启星除发了一些新闻外，重点写了一组六篇内参“东北电力采访札记”：《东北大小电网联网势在必行》《电网分散管理带来的怪现象》《电热不能分家》《烧百家煤的大电厂》《把水电用在刀刃上》《电力企业的呼声》。这组内参发出后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作了批示。电力部部长刘澜波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专门约见了我和王启星，听取汇报。时任副部长的李力耕、李鹏也在场。刘部长对我们的采访和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，认为这对电力部的工作，对电力工业的改革与建设，很有帮助。

在东北三省跑了一圈，对东北这块黑土地，我的故乡，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受。我还写了一首诗《东北是个好地方》，发表在《辽宁日报》上。

在辽宁分社工作了九个月，结交了一批当时很年轻的记者朋友，这些人朝气蓬勃，闯劲十足，非常敬业，顶起了分社半边天。李永长、李新彦、刘欣欣、赵力、赵文泉、董践真、孙连生、姜敏、张小龙等，后来都成为高级记者，业务骨干，其中多人出任各分社的领导职务。

秋去冬来，沈阳城雪花飘飘。1980年1月的一天，我正在省委机关采访，突然接到总社电话，调我回京。

分社全体同志为我举行了欢送会。九个月的朝夕相处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我和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。有一位叫铁汉的老记者风趣地说：“假如我是一个妙龄少女，我一定会说，我爱你！”一句话，引起哄堂大笑。至今，仍有人提起这段趣事，虽然铁汉早已不在人世。

告别沈阳，告别分社同志，我于1980年春节前夕回到北京，接受了另一项工作任务——主编即将创刊的《半月谈》杂志。

东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也是我学习锻炼成长的地方。这将近两年的记者生涯，对于我后来主编《半月谈》杂志、主持国内部工作，以至做新华社的业务领导工作，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
四十年过去了。那段时光，那片土地，那些伙伴，依然铭记于心，历历在目。我后来曾在《松花江赋》中表达过这样的感情：“金秋时节，吾登上八达岭长城向东瞩望，当年伙伴今何在？山川寂寥空怅惘。然透过秋阳白云远树平房，吾冥冥中感知：关东子弟在欢唱《塞北的雪》《太阳岛上》；同辈老友正尽享天伦晚晴，怡乐安康；长白山依旧巍峨圣洁苍郁，松花江长葆美丽清凉安详，黑土地远离战火天灾饥荒。新一代关东儿女，不忘过往历史悲壮，珍惜今日幸福时光，更勇敢投身改革开放之洪流，民族复兴之疆场！”

走读

历史咽喉

李咏瑾

当历史的转折之地精确地出现在你的脚下，眼前所有的风物都沉甸甸地叠加了特别丰富的意蕴深长，目之所及，你会突然觉得浩瀚磅礴的文明发展史对所有人来说并不遥远。

此刻，我在广西贺州北部，在一座双峰呈“丫”状对峙的山下，自古由湘入桂第一村——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古玺山村，像一道从历史深处浮现的谜语，款款地出现在我们远道而来的脚步前。轻轻踏上去，历史就在两边纷呈舒展开来。古村落石板筑就，两旁的竹木门扉因为年深月久，呈现出一种熟透的绯红，与别处的山川一同沉沉呼吸，历经千年，气脉未曾断绝。作为谜底——穿过全村的那条名为“潇贺古道”的六尺小径，远比古村落的历史更加悠远神秘。

当秦始皇策马困顿于这里苍郁的南方丛林时，眼前横亘着岭南这块看似不可征服的天然屏障，“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，于是他唰地抽出利剑，不容置疑地指向南方。公元前213年，秦帅蔚屠睢初征岭南，动用湘、桂、粤三地戍民四十多万人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潇贺古道由此诞生，其带来的生产力变革如同一只巨掌，气钧万千地横扫过这里所有的丘陵与岩层。由咸阳的黄尘广漠延展至广州的碧波浩荡，秦王朝的视线从此豁然开朗，亚热带季风吹来又拂去，珠江、长江、红河、滨海四大水系砰然撞击！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隐隐现出了之后磅礴万丈的雏形，从这里开始，华夏子孙的脚步一路延续至印度、中亚、西亚以及遥远的非洲大陆……

曾经有一个诗人，想在“潇贺古道上等一匹马”，他用绮丽的诗句描摹了这里的野菊和酢浆草从古而今的芬芳，“濂溪水不语，棉纱未干，米酒在马背摇晃”，诗人和我，同时看见了这段历史的烟尘扑面。而眼前的这个古玺山村，就是数千年来那些跋涉在古道上的游子和马帮滴落的汗水、交叠的身影。最开始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：“天色向晚，就在这里生火做饭歇息一晚吧。”暮色四合，漂泊的旅人们眷恋地望了望身后的来时路，再充满期冀地望了望南方巨大的紫蓝色天空，最终停驻于脚下的方寸土地。于是，这片大地上渐渐繁盛起了十里亭、风雨桥，以及和古玺山村一样的人类繁息之所，铁匠叮叮打铁，烧酒铺老板叫卖醇酿，油茶碗里一冲，马上起了几个喷香的、油汪汪的旋子，拿来配这里独有的“梭子粑粑”，正好一口一个……从秦汉年间的谪戍移民到近代的客家人“下南洋”，数千年间，每一次移民大潮的汹涌而至，都给岭南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洗礼。

作为中国四大古镇之一的黄姚，比肩于北边的平遥、东边的周庄与西边的凤凰，却并不如位于贺州昭平县东北部这三者赫赫有名。但黄姚不争不恼，这发祥于宋代的小镇，带着宋人特有的云淡风轻，八大景二十四小景，古民居、古磨盘、古围墙、古戏台、古阁楼、古石板路……悉数遮掩在葱茏而巨大的古榕树中。村头那株最为耸天蔽日的龙爪榕是所有人的祖父，庇佑了小镇千年，祖父也累了，缓缓地弯下了自己沉重的腰身，小镇的子孙们以巨木和水泥作桩，小心翼翼地支撑起他巨大的身躯，寄生藤以及气根紧紧缠绕包裹着倒立下来的枝干，化身为遒劲的巨大龙爪，轻轻地罩住了子孙的来路与归途。

2006年，同样是这条石板路，著名作家毛姆的神魂挟着那本《面纱》再一次走进了黄姚。将近一个世纪之前，他或许曾漫步于这里的带龙桥，经过宝珠观，喝过仙人古井里的神仙水，对这里的雨落涟漪眷恋不已。于是，他的文字与思想穿过大半个地球，终于湿润地抵达于中国南方的绵纸之上。

作家地理

沈从文的福地

“达子营二十八号院可以说是沈从文的福地，在这生活的四年，是沈从文最安定、幸福的时光，也是他文学生涯最辉煌的时刻

绿茶

1923年，二十岁的湖南青年沈从文开始了北漂生活，然而，他的北漂生活并不顺利，五年后，他和好友胡也频、丁玲又漂到上海，三人办出版社、创杂志，干得挺来劲，但好景不长，三位文学青年并不擅长经营，很快赔得一塌糊涂。沈从文接着漂泊，先后漂到武汉、青岛等地谋生，身体的漂泊和情感的没着落，让沈从文郁郁寡欢。

1933年，三十岁的沈从文结束了漂泊再回到北平，应杨振声之邀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。同年9月9日，沈从文凭借多年持续不断的情书，终于撩开了女神张兆和的芳心，迎来感情的着落，婚礼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。新婚后不久，接手主编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。沈从文在漂泊十年后总算稳定了下来。

婚后他们租住在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院，合肥四姐妹的四妹张充和在回忆中说：“新居小院落，有一枣一槐。正屋三间，有一厢，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。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，四壁空空，也无一般新婚气象。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气氛，是梁思成、林徽因送的。”

达子营二十八号院可以说是沈从文的福地，在这生活的四年，是沈从文最安定、幸福的时光，也是他文学生涯最辉煌的时刻。查看沈从文创作年表，发现下面这些作品均完成于达子营小院短短的四年，包括短篇小说《虎雏》《猎人故事》《扇陀》《月下小景》《阿黑小史》《八骏图》《新与旧》《主妇》等，中长篇小说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《边城》，散文《从文自传》《记丁玲》《湘行散记》等，文论《废邮存底》《烛虚》等。

除了文学创作，达子营二十八号院还是北平重要的文学据点，当时沈从文除主持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外，还参与发起了《水星》和《文学》杂志等，随着《边城》《从文自传》《湘行散记》等作品的发表，沈从文在短短几年成为全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达子营二十八号院更是成为北平文学会场，每日来来往往的文坛友朋和仰慕者无数，小院厢房里热闹非凡。

我们读《边城》，不由好奇是什么情境让沈从文能写出像《边城》《湘行散记》具备很高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。以下几个因素大致都具备：

其一，经历过漂泊的人应该都有共鸣，可安身的房子和有着落的感情，是对漂泊生活最好的抚慰，达子营二十八号院这个安全港湾应该是最佳的证明，可惜我们今天已寻不到这处旧居。

其二，儿子龙朱和虎雏的出生，更倍增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美满，也激发创作的源泉，直接反应是创作了《虎雏》《主妇》等作品。

其三，文坛声望日隆以及主持多种文学副刊，更让曾经很自卑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有了足够的自信，并爆发超强创造力，《八骏图》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等作品就是证明。

其四，早年的湘西生活经历和阅读积累，在经历十年漂泊后稳定下来，内心不由流露出对乡土生活的诸多感触，《边城》《湘行散记》就是这种情感回归的见证，也是沈从文最得心应手的文学表现。

只是没想到，战争打破了这样的安逸，1937年北平沦陷，沈从文随北大、清华师生撤离北平南下。达子营二十八号院成就的文学传奇自此画上了句号。

感怀

终将老去

姜杰

坐在病床边，望着医院的窗外，夏的树叶争相吐绿，似乎和楼里风烛的生命在炫耀。

生命的降临是那么的顺利、美好，自然而然，可是，谢幕的过程却是如此的崎岖。

妈好强了一辈子。打记事起，我妈就是个永远不会给别人添麻烦，永远把家里家外打理得妥妥帖帖的女人。如果她知道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自己吃饭会如婴儿般吵闹，要编故事哄着，东编一句喂一口，西编一句再喂一口，一会坚决不吃了，过一会忘了，勺子递来嘴就张开；如果她知道，要紧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睡，否则，十几分钟便醒来，警惕地看着周围；如果她知道，自己大小便经常没有了感知，尿不湿成了必备品；如果她知道，她最心疼的小女儿已几天几夜不眠不休；如果她知道……我想她一定生不如死！

想来，老天也是眷顾妈，让她高速运转了一生的大脑，最后完全地退化了，退化到如在襁褓中一样，整日咿咿呀呀，说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故事。可是无论怎么退化，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永远是抹不去了。

妈，我是谁？

你，你是我女儿。你是谁？

我是吗？你记错了吧。

别说这，我就是七老八十了，也不会记错，你放宽180个心。

那你今年多少岁了？

我，我想想，一五一十，我35了。

假如，人生真有来世，我想我一定会这样看着35岁的你，在你怀中，牙牙学语，抓紧你的指头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只可惜，我们就要坐到站了，下一程，你就丢下我了……

一瞬间的清醒，你会盯着我看，认真地告诉我：“我要走了，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”接下来的一句，又去了没由来的地方。

我知道，这一天是终究要来的。我也知道，一生病病歪歪的你，能坚持陪我到结婚、生子，到即将老去，已是多么的不易。只是，终究还是贪心，总是要了还想要，有了还想有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出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年少拼搏，努力忙着成材，忙着成功，忙着立言、立人、立心……终究不过是奔向归途的路上多了几束鲜花、几朵彩云。可转念一想，即便如此，也只有这样才不枉人世一遭，也只有这样才会留下点生的印迹。

为什么越成功的人越是要努力？网红的解释是，奋斗的理由是年轻时不拖累生你的人；年老时不拖累你生的人。要加上一句：临去时不负疚昔日的初心。

世间

“距离感”就是“文明”？

“作为陌生人来到一个城市，安全和礼仪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城市天然地比农村更加“文明”，大家都很注重分寸。但是，等到时间长了，你总得迈出脚步，和他人进行更深入的联系

张丰

从成都来到深圳，我在公司附近短租了一间房子。这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，我来的时候，最大的带卫生间的卧室，住了一个女孩。剩余的两间卧室，我选了较大的一间，两天后剩下的一间住进来一个小伙子。

合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，这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体验，让我想起刚从学校毕业时的岁月。客厅很大，装修得也很好，有餐桌和沙发，但是大家都不在客厅活动。每个房间都装有智能锁，从外面回来，输入密码，就进入了自己的房间，以致于住了一个月，都没和他们说过话，和电视剧中演的合租生活完全不同。如今技术先进，费用都可以从APP上直接支付，连这种容易起纠纷的事情，都不再需要沟通了。

有限的两次接触是这样的。有一天出门前，我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就出门了，中午回来晾衣服，发现它们已经在阳台上晾好了。衣服挂得非常完美，我猜这是那个女孩的手笔，因为旁边也晾着几件女士服装，让我在感动之余也有点尴尬。还有一天早上，我喝牛奶的杯子从手上滑落，清脆的一声响，碎了一地。旁边的门开了，那个小伙子睡眼蒙眬出来：“你们是吧。”

这就是仅有的互动了，我们对这种状态非常满意，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的隐私，彼此的距离拉到最大。这种局面有一天被打破了，突然来了阿姨和一个婴儿，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住大卧室的女孩，竟然是一个年轻的妈妈。她依然早出晚归，客厅鞋柜里几十双高跟鞋，表明她还住在这里。那两个阿姨，有一个应该是女孩的妈妈，现在带着婴儿和女孩团聚来了。

客厅突然有了生气，餐桌用了起来。我下班后回到住处，阿姨已经做好了饭菜，她招呼我一起吃饭，我表达谢意之后，慌忙跑进自己房间躲起来了。之后到厨房处理自己可怜的餐食，阿姨也会好奇地跑过来：“你要做什么菜？这里有蔬菜，一起来吃吧。”这种热情弥足珍贵，让我想起家的温暖。如果是我的母亲，也一定会这么做。房间里有人，喊过来一起用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

但是，这样热情也让我感到有点不适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冷漠相对，这种冷漠甚至让我们感到自在和温暖。我们关在自己的小房间，用手机和全世界进行沟通，但是却不愿意和同租一套房的人多说一句话。那种远距离的、有时甚至是虚拟的关爱，让我们感到更安全，近距离的关心，反倒像一种侵犯。我们经常强调所谓“距离感”，认为这是文明的标志，但是却又无可救药地陷入孤独之中。

短短几天，我和阿姨们的“被迫交流”，已经远远超过之前一个月和两位同租年轻人的交流了。我甚至还逗了一会儿那个婴儿，他不哭不闹，让人完全感受不到打搅。我可以从不标准的普通话中揣测出阿姨的家乡，也能想到那个早出晚归年轻妈妈生活的艰辛。她个子很高，穿着时尚，在公司里形象完美，但是谁又能想到她出租屋里还有一个这样的小孩呢。

可能这就是城市的本质。每个人都作为陌生人来到这里，安全和礼仪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城市天然地比农村更加“文明”，大家都很注重分寸。但是，等到时间长了，你总得迈出脚步，作为一个人，你需要和他人进行更深入的联系。小区门口的保安，每天给我开门，我都鞠躬致谢，突然有一天，我没有急着进来，和站在门口的他聊了一会儿。

来租房的那天，约中介一起看房。是一个背双肩包，白白净净的小伙子，他为自己迟到五分钟道歉。服务流程非常规范，基本上就是指导我如何使用一个公寓管理APP。合同签好，一切交代清楚后，我们一起下楼往外走，他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深圳的房租真的是太贵了。”他礼貌地称我为“张先生”，而不是像成都的各种中介那样亲热地喊“哥”，这体现出他们服务的规范，也保持了彼此的距离。但是他那句不该有的对房租的“负面评价”，却表现出了一个人真正的情感，也让我感受到了某种欢迎的味道。